

理论会终结吗？

——近 30 年来理论危机话语回顾与展望

陈后亮

内容提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有关理论终结的话题开始成为学术界议论的焦点。事实上，虽然有关理论死亡的传言甚嚣尘上，但在整个 90 年代，人们对理论的未来仍抱有乐观态度。理论经历的所谓死亡只是一种幻象。理论在 60 年代末兴起到 80 年代进入鼎盛，都不仅是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更受外部语境的影响。实际上，新世纪以来真正陷入生存危机的并非仅是理论，而是整个人文学科。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人们谈论文学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文学活动被日益边缘化的功利主义社会，即便人们真能抛弃理论，也似乎很难有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让文学重新回到公众生活的中心。但理论永远不会消亡，只是它的存在方式必将发生改变：不是作为批评方法，而是作为关于文学的思考方式。

关键词 理论的终结；后理论；解构主义；体制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有关理论终结的话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以“理论的终结”或“理论之后”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版，相关专题的学术会议也频繁召开。一方面，人们看到过去几十年出现的理论大师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新的学术明星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随着所谓“新审美主义”“伦理学转向”“回归文本”等口号的出现，那些曾被理论压抑了几十年的传统话题又再度被提起，成为学术会议和期刊发表的关键词。似乎理论真的已耗尽生命力，正沦落为可有可无的边缘角色。理论真的已经终结了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否则人们就没有必要继续讨论理论终结的话题。但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终结？这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理论的终结既意味着理论家事业的终结或转向，也意味着文学研究方式的某种调整。彼得·巴里（Peter Barry）在《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一书中，曾以时间为轴，通过梳理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个关键事件”——包括重要学术会议的召开、代表性专著的出版以及引发公

众关注的热点事件等——来讲述“一个有主题贯穿的叙述”，继而描绘出“理论的轨迹”^[1]。巴里的研究给了我们启示：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法回顾自理论陷入危机以来出现的重大文学“事件”，对种种反对理论、宣称理论已是过去时的说法——本文统称之为“理论危机话语”——进行检视，或许有助于我们看清理论在当下的处境，并为我们反思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未来提供启发。

一 序曲：20 世纪 80 年代

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从来不乏尖锐的反对之声。其中最轰动一时的莫过于始于 1982 年、持续十余年的“反理论”运动。1982 年夏天，两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青年学者史蒂芬·奈普（Steven Knapp）和沃尔特·麦克斯（Walter Michaels）在权威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合作发表《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一文，以一种非常确切的口吻宣称“整个批评理论事业就是被误导的，因此应该被抛弃”^[2]。

这篇战斗檄文般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美国理论界引发巨大反响。E. D. 赫施、斯坦利·费什、理查德·罗蒂、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以及约翰·塞尔（John Searle）等都纷纷撰文加入讨论，形成支持和反对理论的双方阵营，论辩前后延续十余年。可以说，由奈普和麦克斯发起的这场争端的影响力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多在近几十年的美国学术界都属罕见^[3]。

奈普、麦克斯和费什等人反对理论的主要理由是，他们认为理论根本不能产生它所宣称的后果，它既不会改进文本批评实践，更不能带来社会变革。文本并不含有一个固定的意义之核，因此也就没有唯一正确的权威解释。任何理论都不能保证其操作者按照设计好的方法得出预期后果。在这一点上，反理论者的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但在另一方面，反理论运动也呈现出悖谬之处。虽然他们打着“反对理论”的旗号，抨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但他们在真正推进文学批评实践上并未有多少作为。他们在前后十多篇论文中先后批驳了大量理论家和理论学派，却唯独没有一篇涉及真正的文学文本批评。故此威尔逊才不无嘲讽地说：“奈普和麦克斯的文章在言辞上很激进，但一切仍然照旧，包括理论。”^[4]也就是说，反理论运动并未真正对理论事业产生多少副作用，反倒客观上助推了理论的知识生产。至少在双方论辩的十多年来内，有十余篇重量级的文章都发表在《批评探索》上，使理论之争成为学术热点，这本身就是理论的胜利。

实际上，虽然反理论运动如火如荼，但80年代的理论家们并不相信理论真的会就此终结。1982年，就在反理论运动发起不久，解构大师保罗·德·曼便在《理论的抵抗》一文中乐观地宣称：“文学理论不会有死亡的危险，它只会继续繁荣，而且越受抵制越繁荣。”^[5]德·曼在此所说的理论主要是指解构主义。他认为，解构式阅读最大的功绩就是引导人们关注语言的修辞或隐喻维度，注意语言作为不受控制的不透明中介对意义生成的塑造和干扰。理论之所以受到抵抗，就是因为它“扰乱了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揭露了它们的运作秘密”^[6]。不是解构主义摧毁了文学经典，而是因为语言的本性决定了经典和意义的不稳定性，它们

始终在以人们意识不到的方式进行自我解构。抵抗理论就是拒绝把语言当作问题来思考，就是幼稚地坚持语言的透明性和稳定性，而这是注定不可能的。

J. 希利斯·米勒在1986年就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主席时以“理论的胜利”为题发表就职演讲。这次演讲也曾被巴里视为理论走向辉煌顶点的“关键时刻”^[7]。米勒的演说透露出对理论胜利的高度自信。在他看来，人们对理论的攻击越猛烈，反倒越是说明理论的胜利，“若不是因为它活跃且有威胁，也就不会受到攻击了”^[8]。他和德·曼一样乐观，认为当时正在发生的根本不是理论的终结，而只不过是理论的转向，即“从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理论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性别、社会语境、制度化意义上的物质基础、生产条件、技术、分配以及文化制品的消费，等等”^[9]。这种转向的发生正是得益于理论——米勒所指的也主要是解构主义——对人们的思想启蒙，即不再把意义视为内在于文本的固定之物，而是关注意义在世界“文本”中被建构、播撒和自我解构的方式和过程。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米勒发表演说之后不久，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英文教授斯泰恩·奥尔森（Stein Olsen）出版《文学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Literary Theory*）一书。作为一位非常典型的传统文学批评家，奥尔森反对包括新批评在内的一切现代批评理论，认为它们都是“化约式理论”^[10]，在他看来，文学作品都是不可化约的有机整体，我们只能在欣赏中把握其整体审美特征。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通篇都在谈反对理论的这部著作，居然从头至尾都没有涉及文学文本分析，而只是用一个又一个的美学概念来反驳理论，以至于它本身就完全构成一个理论文本，只不过用“诗学”“美学”“整体”等传统概念作为替换而已。这似乎更印证了米勒和德·曼的预言：在经历理论的洗礼之后，一切单纯的反理论企图都是幼稚的，很难有实际效果。

二 90年代的理论幻象： 终结还是转向？

就在解构批评家们对自己信心满满的时候，

于1987年爆出的有关保罗·德·曼与纳粹法西斯有染的政治丑闻给整个理论事业带来第一次沉重打击。德里达为了挽救解构主义而为德·曼做出的不恰当辩护更加剧了人们对理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质疑。似乎理论大厦真有摇摇欲坠之势。然而事实上,这次事件只是加速消解了解构主义的话语霸权,使之尽快让位于其他更有活力的理论流派,并未对理论事业本身构成致命打击。正如巴瑞所评,即便没有德·曼的丑闻事件,人们对解构主义的兴趣也会丧失,因为解构主义从根本上来讲仍是一种关注语言、文本和文学性的形式主义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如果只把眼睛盯在语言上,就像盯着太阳看一样,时间长了会伤眼睛。你很快就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11]纵观整个90年代,虽然有关理论死亡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人们对理论的未来仍抱有乐观态度。凡是宣称理论已经终结的人,都只是简单地把理论等同于源自法国、以解构主义为主的宏大理论,即所谓“大写的理论”(Theor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这种大写的理论不同于任何关于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具体理论,它既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文学、服饰、饮食、语言、体育等一切人类文化和生活实践都可以被拿来研究,也没有固定的研究方法,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临床医学等皆可拿来为我所用,构成一套“对语言、身份、话语以及生命本身进行反思的、让人兴奋的整体思想”^[12]。这套理论在80年代不只流行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颇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政治实践陷入低谷的后革命时期,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宏大的新思想武器,声称可以用来动摇甚至摧毁旧的政治体制赖以维系其统治的文化根基。

然而除了在用一种语言模式解构经典文本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之外,法国理论在面对与人们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时却显得大而无当。于是90年代以后的理论纷纷转向更加聚焦于文化实践的批评领域,不再沉溺于“对语言的本质、解释和知识的大规模思考”,而是迈向“更加具体化的路径”,把关注的焦点“从语言和隐喻转向历史、文化和身份等”^[13]。也就是说,理论在整个90年代并没有死亡,而是悄然发生了变化。从以解构为

主的大写的理论分化出在研究对象和关注范围方面更加具体的众多小理论(theories),比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身份研究、文化研究等。它们与之前的解构理论的关系不是断裂,而是继承和连续。解构主义所热衷的那套批评概念,如中心、边缘、在场、差异等,也正是它们运用最娴熟的理论武器。毫不夸张地说,解构主义塑造了整个90年代批评理论的思想轮廓,形形色色的小理论“都具有了一种共同的知识态度或批评气质”^[14],那就是对一切未经反思和检验的知识前提提出质疑,并取得多种思想突破。

换句话说,在整个90年代,理论经历的所谓死亡只是一种幻象。理论没有死,只是变得“更加多样化、传播得更广泛、更加跨学科”^[15]。它几乎已完全扩散并渗透到文学研究机构,成为人文学者必须掌握的基本素质。在90年代至世纪之交美国各个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理论研究仍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大多数仍透露出自信、乐观的语气。最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或论文集,比如伊格尔顿的《理论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1990)、斯蒂芬·恩肖(Steven Earnshaw)的《文学理论的方向》(*The Dire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1996)、马丁·麦奎兰(Martin McQuillan)等人编著的《后理论:文化批评新方向》(*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1999)、让-米歇尔·拉巴特(Jean-Michel Rabaté)的《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ory*, 2002)等,单从题名上就可看出,他们讨论的并非理论的终结,而是在为理论的未来走向诊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理论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正是在这一时期。几部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也都是在此时出版的,且都是连续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销量惊人。比如前文提到的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1995年初版)、凯斯·格林和吉尔·乐比翰(Keith Green & Jill LeBihan)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科书》(*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urse Book*, 1996年初版)和卡勒的《文学理论导读》(*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1997年初版)等。另外在60年代至80年代初版的几部理论导读,比

如维尔福莱德·古尔灵（Wilfred Guerin）等人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1960年初版）、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1985年初版）、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1983年初版）也都在90年代纷纷推出新版，并且在内容上都有较大幅度增添。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至少在90年代末，理论非但没有终结，而且依旧是最受欢迎的学术热点，只不过从内涵上来说，它已经不再是由解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宏大理论范式，而是分化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研究、酷儿理论等多种更具体的理论流派。用王宁的话来说：“西方文论界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糅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16]

三 2003年：一个标志性年份

在所谓后理论话语的讨论中，2003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有几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同时发生。其一是在英国召开的以一句噱头式的问话“理论之后还有生活吗？”（*Is There Life after Theory?*）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后由米歇尔·培恩（Michael Payne）和约翰·斯凯德（John Schad）共同主编一部题为《理论·之后·生活》（*Life After Theory*）的论文集，内容主要是对包括德里达在内的几位参会理论家的访谈。在前言部分，两位编者悲观地宣称：“文学理论——我们这个世界的思想——似乎已经来过，又走了。‘崇高’理论的时刻已然结束。”^[17]同年，曾经在1983年以《文学理论导论》极大助推理论事业发展的伊格尔顿却出版了一部听上去像是敲响理论丧钟的名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其实他的本意并非说理论已经死亡，而是说“已然消失的只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而不是理论已经彻底消失；它肯定仍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可能还会活得很好，只不过会失去曾经备受尊崇的优势地位”^[18]，但很多人还是被他开

篇那句颇有讣告意味的判词“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19]以及具有历史分期意义的标题“理论之后”所误导，误以为理论真的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已经处于理论大师离场后的真空时代。自此，“后理论”或“理论之后”正式借伊格尔顿之口成为学术关键词，以它为标题的学术出版物不断出现。就和当初的“理论”一词一样，在其内涵仍旧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被迅速包装、复制、传播，成为又一个学术神话，俨然我们处在后理论时期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2003年发生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一场号称“前所未有的头脑峰会”^[20]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批评探索》杂志发起，以“理论的未来”为主题，召集全美20余位最顶级的理论家在芝加哥大学召开。参会人员包括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霍米·巴巴、费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超过500名听众聚集在会议大厅，还有更多晚来的人只能在外收看电视直播。人们都想一睹这些理论家的风采，获得最新的理论动态，唯恐错过时机，又被新一轮的理论浪潮落在后面。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后，现场居然出现长时间的冷场，直到一位学生用一个犀利的提问打破局面。他的提问和之前的反理论者很接近，即理论究竟有什么用？几位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现场回答无疑加剧了普通听众对理论的误解。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桑德·吉尔曼（Sander Gilman）教授声称：“我认为大部分批评……都是有毒的药片。我认为我们不能轻易假定知识分子都有什么睿见。实际上，如果过去有关知识分子的记载都是可信的话，他们不但几乎从来都是错的，而且他们错误的观点还十分有破坏性和腐蚀性。”^[21]而费什的回答更延续了他一贯坚持的理论无后果立场，他说：“我不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任何效果。我尤其想奉劝那些希望以此带来学术之外的效果的人们不要从事学术活动。”^[22]两人对理论家形象的描述显然都很负面。在他们看来，理论家不过是卖弄学问的腐儒，往好了说是无用的，往坏了说是有害的。现场只有霍米·巴巴一人坚持为理论辩护，左派政治依旧是她最主要的辩护依据。她说：“这张会议桌旁围着这些人，那边还有那么

多听众，这本身实际上就说明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是有其位置和作用。……甚至一首诗也以隐晦的方式深切诉说着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生活。我们还有很多诗歌与政治对抗运动紧密联系，这些诗实际上把人们召集到一起去做出反抗运动。”^[23]谈论理论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在后革命时代仅余的、似乎尚有尊严的存在姿态了，至少让他们还能够幻想自己在参与政治实践，不仅是为了谋求自己在学术上的声望和成功，更为了实现对一切不公正制度下受压迫之人的正义和解放。不过，霍米·巴巴的辩词迅速就被随后发言的盖茨用一句更无情的发言遮盖：“我真的从未见过这种事。有色人种的解放从来不是因为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24]

在政治上的无用成为这次会议上人们一致对理论进行讨伐的理由。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理论为主题的这次研讨会，人们自始至终都聚焦于当时的热点时政话题，比如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的执政能力、右翼媒体的抬头、左派势力的衰退，等等。真正的理论话题反倒无人问津。这似乎说明，理论一贯宣称自己是政治的，但真正涉及政治问题时，仅以理论的方式讨论似乎又远远不够。只有甩开理论，以更简洁直接的方式讨论时政，才能掩饰其内心对自己政治无用性的担忧。有关这次会议的实际，记者艾米丽·伊肯（Emily Eakin）进行了报道，并以“最新的理论是理论无关紧要”（The Latest Theory Is that Theory Doesn't Matter）为题发表在《纽约时报》4月19日刊上，真正向普通大众第一次宣告了理论的破产，“理论无用”或“理论已死”等口号算是普及开来。坚持理论仍然能够繁荣的人也越来越没有自信，期待对理论的劣迹进行清算、还文学研究以清白的呼声却越来越高。自此，后理论时代才算真正来临。

有趣的是，2004年6月12—14日，由王宁发起并与《批评探索》杂志合作主办的以“理论的终结”（The Ends of Theory）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据称是“2003年芝加哥会议的延续，继续讨论理论和批评的未来”^[25]。会后，王宁和《批评探索》主编米歇尔（W. J. T. Mitchell）合作发表文章，对会议内容作了综述。两位作者认为，芝加哥会议充分暴露了理论面对

现实的无能，以至于让人们认为它行将就木，然而北京会议让人们又看到了希望。理论“在2004年6月的北京看上去依然一如过去、充满生机”^[26]。不过两位作者也指出，这并非说在中国又出现了“伟大的理论突破或者了不起的思想”，而是说理论在中国变得更加“成熟务实”^[27]，它启迪中国学者把这些外来理论本土语境化，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并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21世纪初理论在中国的“繁荣”只是暂时的，它在当时之所以比西方的境况好一些，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理论进入中国较晚，它与西方发展一直存在不同步现象，在西方已进入暮年的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却仍处于成长普及阶段。国内学界很多人对理论还很陌生，虽然有一些反对声音，但大部分人对西方理论还是持欢迎态度^[28]。其次，整个人文学术环境在当时的中国也处于繁荣期。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但那不过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们对未来境遇的焦虑，人文学科整体在当时的处境还没有那么糟糕。世纪之交能够有那么多引人关注的争鸣和热点^[29]，这本身就说明了人文学术的繁荣。直到近十年来，随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的全面渗透，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出现，人文学科在中国才开始面临和西方类似的危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理论在中国也开始遭遇大衰退，各种反对理论的声音纷至沓来。“后（西方）理论”时代在中国也全面开启。

四 新世纪以来的批评焦点： 理论的失效与体制化

虽然有自觉意识的文学理论直到20世纪中期才出现——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写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被视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文学理论导读”^[30]——但实际上那种非自觉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往的批评家尚不以理论家自居。他们大多自认为理论是辅助性的，有固定的思考对象，即文学，且后者也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必听从理论的

指导。批评家不过是文学活动场域中的辅助角色，这是他们长期给人留下的印象。然而从新批评开始，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变得越来越专业，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实验派文学越来越晦涩难懂，离开批评家的阐释，普通读者往往变得茫然无措。批评家不再是文学活动场域中可有可无的边缘人，而是逐渐成为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键中介。新批评时期的批评家还比较谨慎地把自己的视野限定在文本范围之内，通过刨除“作者意图”和“感受谬误”的文本细读，带领读者小心翼翼地发掘文本“有机体”中蕴含的永恒意义。他们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也不过是“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31]，只能起到宏观的指导作用，至多只是让读者清楚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别，并不能指望这些理论对具体的批评实践有多大的帮助。然而理论热时期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批评家不再满足于文学场域内的荣耀，而是要走出文学课堂和大学围墙，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专家权威。他们不但要诠释文学，还要指点江山，对服装、电影、休闲、体育、疾病、性等一切人类活动和生活现象进行剖析，“去夺回丢给其他学科——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生产出那么多有用知识的自然科学——的权威”^[32]。就像当年的利维斯、白碧德、特里林等批评家一样，文学批评家渴望再度成为整个社会最有声望的公共发言人和价值评判者。

正如沃伦·布里希曼（Warren Breckman）所指出的，作为理论最重要的源头的法国理论被移植到美国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被去语境化、错误挪用和阴差阳错地安置的结果”^[33]。法国理论本身并非文学理论，德里达、巴尔特、拉康、福柯都是作为传统哲学（而非文学）批判改造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的思想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性。但他们的学说漂洋过海来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后，最初的落脚地却是在文学院系，其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属性一下子打开了原本局限于文本之内的批评家的视野。人文学者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不但可以解释文学文本，而且还可以对世界上更多的事务发言。法国理论所带有的那种高度抽象、复杂的思想特征给人们一种幻象，即人们似乎掌握了一种能够破译更多秘密的更高级的思想武器，他们的学说不是一般的

思想观点，甚至超过了自然科学那些只描述一般具体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大写的理论、理论之理论。用本·洛克德（Ben Lockerd）的话来说，“他们把真理（Truth）的大写首字母T拿给了理论（Theory）”^[34]，即理论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掌握理论的批评家们关注的不仅是文学文本意义，而且是世界文本背后与人类所有文化活动相关的意义生产机制。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关乎文学价值的传承和递进，而且关乎整个人类社会不公正现状的改造和正义秩序的实现。

然而就在理论家们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假象陶醉之时，它在实践效果上的无能却逐渐暴露出来。由于理论过度夸大自身的社会功能，抬高了公众对其实践效果的期待，失望的人们开始对其进行强烈抨击。对理论实践效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理论杀死了文学，让文学阅读变得无趣，文学作品成了“等待解剖的青蛙”^[35]，大部分学生都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开始学习文学，然而一旦踏入文学研究的大门，他们却发现不得不把兴趣转向抽象枯燥的理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纯然淡泊的文学欣赏，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并且反文学的学术文化”^[36]。要想在文学研究机构脱颖而出，他们必须暂时搁置对文学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想法，同时在理论的指引下，对他们此前一切未经反思和检验的有关文学的假定提出质疑：文学、作者、读者、经典、意义、价值、真理、美……所有这些都不再是不证自明的透明概念，而是成为需要被问题化的政治上可疑的对象。非但如此，当他们真打算把理论当成破解文学作品的工具时，却又发现它除了打碎以往文学作为一个有审美价值的封闭实体的幻象之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让人满意的批评实践。于是理论被比作让人讨厌的“磨坊”，它把文学作品当成“谷物”^[37]来加工，无论多么美好的作品，一旦经过理论的碾磨，也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总之，很多人认为至少在文学批评层面，理论是弊大于利。就像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唯一的企图就是“以其他方式推行政治实践”，“他们给学生灌输（政治正确的）信仰，而不是让他们在政治领域做出正确行动。他们将生

产出没读过最伟大作品却满脑子装着正确态度的英文专业学生，他们将成为对文学的意义、真理和美感的愉悦都一无所知的年轻教师和职业者”^[38]。

其次，对理论无用性的另一个指责来自政治实践。正如伊格尔顿曾指出的，比较主流的看法都认为理论的兴起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失败有密切关联，它是作为现实政治实践的替代品出现的。

“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的混合中生产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39]通过解构作为西方整个传统统治结构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理论家们必将把革命的火种从语言引向社会现实。然而在经过近20年的时间之后人们发现，理论的政治诺言越来越像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噱头，除了破坏原有的有关真理和正义的共识基础，并衍生出各种各自为战的零碎身份政治、文化政治和性别政治之外，它并没有、也越来越没有希望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反倒日益演变为学者们维护自我职业地位的垄断话语资源。在招生规模和研究经费都不断缩减、人文学科日益边缘化的时代，人文学者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像科特·斯拜尔梅厄（Kurt Spellmeyer）所挖苦的那样：“理论成了有特权却正日益衰退的机构的特有话语，它关心的东西距离日常生活太过遥远，以致这些专家自身也有了危机感。……他们在那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话语中迷失了自己。”^[40]这也正是上文所述的费什对理论的实践效果不抱任何幻想的原因。理论和理论家一样，都被现代大学教育机构严重收编和体制化。在就业市场和研究基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调控下，空留一丝仍在谈论政治的幻象，实质早已沦为它假意批判的对象——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理论最失望的地方恰在于此。虽然它还时常摆出一副关心自由、正义以及一切公共福祉的样子，但更多情况下更关心自己的学术声望和职业前景，在知识经济时代，理论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成为有交换价值的物品，“被塑造成商品或产品的样子，被拿去包装、交换和消费”^[41]。虽然并没有实际用途，但因其晦涩高深，

难以接近，成为学者沽名钓誉的符号资本。自此，理论真的彻底失去往日的荣光，甚至被某些激烈的批评者讽刺为文学教授们“自私自利的策略”^[42]、“通往成功的门票”、“精英机构中的一些能够接触前沿知识的人群在更多人尚未涌入之前玩的进进出出的游戏”^[43]。理论成了如此被众人唾弃的对象，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五 反思：理论的危机还是学科的危机？

在伊格尔顿那部经典的《文学理论导论》中，一个贯穿首尾的中心观点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44]理论在60年代末的兴起以至80年代的鼎盛，都不仅仅是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更受外部语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左派社会运动退潮、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冷战意识形态、婴儿潮一代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等等。90年代以来所谓理论的终结也同样是受到外部变化了的语境所影响，不能仅归罪于理论自身凌虚蹈空等问题。

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它非但没有像有些人预期的那样从晚期资本主义进入死亡的倒计时，反倒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达状态。尤其是在经历新千年的重大金融危机以后，虽然从表面上看，作为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有濒临破产的可能，但实际上它只是临时性地受到一些质疑和调整，美国政府出台的一些大规模经济救助计划并非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干预的回归，反倒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已全面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切由市场说了算”成了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各个社会部门的指导原则。它其实并非是对此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彻底放弃，相反却是一种强化升级，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变化，然而批评家们仍未找到新的方案来回应它。故此，就在很多人热衷讨论理论终结话题的时

候，文森特·里奇（Vincent Leitch）倒是给出了一个更清醒的建议。他认为，学者们此刻最应关心的不是理论是否已经终结，而是“在未来的大学和学院里，文学和文化理论应该在何处栖身并继续从事研究”^[45]。毕竟，理论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理论家职业前途的终结，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的灰暗前景。

在今天这个以市场和效率为导向的环境下，如果人们再像新批评以及之前的一切自由人文主义者那样重提所谓文学研究的“无用之用”或“半自治性”，必定是行不通了，高等教育的投资者和捐助方不会有耐心容忍这样低效率的学科继续存在下去^[46]。另一方面，如果批评家们还想维持80年代那种与主流社会不合作的文化批判姿态也已不可能，因为文化生产已经完全和市场逻辑重合，一切都已沦为商品经济的俘虏，不再有世外飞地，也不再批判距离。像左派批评家那样以为可以用批评话语抵制文化主导并带来政治进步，在被强化了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已不再可能。“即便我们能够在理论中确定某种天真的、对主导经济律令的抵抗，这也不一定就能带来任何政治进步效果。”^[47]

其实，真正陷入生存危机的并非仅是理论，而是整个人文学科。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人们谈论文学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文学活动被日益边缘化的功利主义社会，即便人们真能抛弃理论，也似乎很难有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让文学重新回到公众生活的中心。美国作家史蒂芬·马切（Stephen Marche）最近在老牌文学杂志《泰晤士文学增刊》（*TLS*）上发表文章，讲述他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学参加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2019年年会时的经历和感受。他所描述的会议惨淡景象很直观地反映了人文学科在当今美国“彻底且急剧的衰退现状”^[48]，表示“绝望”（despair, desperate）的用词在文中多次出现。绝大多数人文专业博士生现在毕业后找不到学术性工作，不得不转行从事非学术性工作。而面临生源和经费麻烦的人文院系也不得不寻求转变，开设一些更能吸引学生、更有就业市场的非传统课程，比如创意写作、影视和传播等。马切认为，导致人文学科陷入今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经济

不景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国民休闲和阅读时间的减少，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体。希利斯·米勒也在最近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不无悲观地坦承“直到不久之前我还宣称文学研究有巨大价值，但在这个新的电子通信统治时代，我再也没有那么确信了。”^[49]各种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的新宠，他们用于文学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功利主义盛行、通讯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文学原本所具有的三个最主要功能——实用指导、道德教诲和审美愉悦，都已经对大部分公众失效。借助无处不在的通讯技术和信息网络，人们可以轻松便捷地获得各种所需的实用信息以及丰富多彩的愉悦方式，这些都不是阅读文学作品所能够比拟的。道德教诲更不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人们留恋文学的主要理由。无论作家和批评家们怎么哀叹、惋惜抑或反抗挣扎，恐怕都很难重振日渐萎靡的文学。卡勒和马切都建议，人文学者必须改变自己做研究的一贯方式，比如投其所好地关注年轻人喜欢的电子游戏和新媒介批评，或者关注与社会大众更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全球变暖和环境危机等，以此重新唤起全社会对人文研究的兴趣，从而走出危机。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只是暂时的补救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文学术困境。在经济功利主义势不可挡、电子娱乐媒体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文学王国的版图恐怕还会继续萎缩。但文学也不会彻底消亡，它永远会被留下一小部分来充当这个日益丰盈却又越来越贫瘠的物质社会的点缀，成为人文精神资源未被彻底耗尽的符号象征。文学不会消亡，也就意味着理论不会消亡，它就像伊万·凯勒斯（Ivan Callus）和斯迪凡·赫布里史特（Stefan Herbrechter）所说的“一种病毒”^[50]，既然已经感染，就必将永远伴随文学活动终生。

理论不会消亡，但理论的存在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其实，理论从一开始就不应被误解，它不是“可被普遍机械地运用于所有文本之上的一套工具、程序或方法”^[51]，不能把它当成像灌香肠的机器一样，从这头塞进去文本，从另一头生产出新的解读。这种机械教条的运用与理论倡导的灵活思辨恰恰相悖。理论其实主要是一种思考方式，“它将永远不仅仅是‘文学理论’或者用来解读文本的‘方

法论’”^[52]。笔者也曾认为,“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关于文学实践的反思性话语实践。只要有文学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这种反思就不会停止,因为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和调整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源泉”^[53]。

无人可以否认,理论已经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场域,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都不大可能继续像传统人文主义者那样缺乏理论反思意识。从这方面来说,理论也是卓有成效的。理论虽然不可能再像鼎盛时期那样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心话语,却必然会渗透在文学创作、阅读和批评教学的方方面面,并且它渗透得如此彻底,有时候甚至稀薄得不可见,以至于让人怀疑它是否已经真的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当我们用“理论”意指80年代鼎盛时期的那种宏大理论范式时,那么可以说它真的已经死了。但如果我们用“理论”指的是那种反省文学活动的思维方式,那么它必将永生。只是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被打了问号的。无论如何期待,文学系内发生的阅读革命都不可能再波及教室之外,它甚至连文学研究者本身的信念以及走出教室后的行为都难以影响。因为文学和理论都将继续存在,批评家和理论家的事业也得以继续。在面积日渐缩小、与消费市场间的距离也几乎消失的域外飞地里,他们之所以还以一种貌似严格和紧要的方式谈论理论问题,或许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所悲观地理解的那样,只是因为“争辩的结果会影响到我们是被雇佣还是被解聘”^[54]罢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理论’背景下当代西方文论热点研究”(批准号18BWW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1][7][11] 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62, p.273, p.274.

[2] Steven Knapp & Walter Michaels, “Against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vol.8, no.4 (Summer 1982), p.724.

[3] 有关这次“反理论”争辩的详细情况,可参阅陈后亮:《简评反理论思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14日,第B01版。

[4] George Wilson, “Again, Theory: On Speaker’s

Meaning, Linguistic Meaning, and the Meaning of a Text”, *Critical Inquiry*, vol.19, no.1 (Autumn 1992), p.185.

[5][6]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19, p.11. 该文最初以论文形式发表于 *Yale French Studies* 1982年第63卷,后与其他论文一起收入以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为题的论文集,内容也略有修改。

[8][9] J. Hillis Miller, “Presidential Address 1986. The Triumph of Theory, the Resistance to Reading,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Material Base”, *PMLA*, vol.102, no.3 (May 1987), p.286, p.283.

[10] Stein Olsen, *The End of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

[12] Jonathan Culler, “French Theory Revisited”,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vol.18, no.1 (2014), p.11.

[13] Jeffrey Williams, “The Death of Deconstruction, the End of Theory, and Other Ominous Rumors”, *Narrative*, vol.4, no.1 (Jan. 1996), p.26.

[14] Ian Hunter, “The History of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vol.33, no.1 (Autumn 2006), p.81.

[15] Cary Wolfe, “Theory as a Research Programme”, in 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eds.), *Theory after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1, p.34.

[16] 王宁:《“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

[17] Michael Payne & John Schad, *Life. After.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3, p.ix.

[18][53] 陈后亮:《“将理论继续下去”——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9]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第3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0][21][22][23][24] Emily Eakin, “The Latest Theory is that Theory Doesn’t Matter”,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2003, p.D9, p.D9, p.D9, p.D9, p.D9.

[25][26][27] W. J. T. Mitchell & Wang Ning, “The Ends of Theory: The Beijing Symposium on *Critical Inquiry*”, *Critical Inquiry*, vol.31, no.2 (Winter 2005), p.265, p.267, p.269.

- [28] 有关国内学者当时对待西方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态度,可参见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29] 有关世纪之交的国内人文学学术热点,可参见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30] Steven Earnshaw, *The Dire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96, p.2.
- [3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3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 [32] John Rouse, “Review: After Theory, the Next New Thing”, *College English*, vol.66, no.4 (Mar. 2004), p.460.
- [33] Warren Breckman, “Times of Theory: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French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71, no.3 (Jul. 2010), p.342.
- [34] [37] [38] Ben Lockerd, “The End of Literature”, July 29, 2010, <http://www.imaginativeconservative.org/2010/07/end-of-literature.html>, 2018-11-02.
- [35] [36] Lorien Goodman, “Teaching Theory after Theory”,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vol.42, no.1 (2007), p.110, p.110.
- [39] [44]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123, pp.169-170. 此处借用了伍晓明的译文。参见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第139页,第1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40] Kurt Spellmeyer, “After Theory: From Textuality to Attunement with the World”, *College English*, vol.58, no.8 (Dec. 1996), p.897.
- [41] Patrick Ffrench, “The Fetishization of ‘Theory’ and the Prefixes ‘Post’ and ‘After’”, *Paragraph*, vol.29, no.3 (2006), p.109.
- [42] Robert de Beaugrand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the Challenge Ahead”, *SPIEL: Siegener Periodicum zur empiri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vol.16, no.1-2 (1997), p.42.
- [43] Thomas Benton, “Life after the Death of Theory”,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51, no.34 (2005), p.C2.
- [45] 转引自 Jeffrey R. Di Leo, “Floods, Droughts, and the Future of Theory”, *American Book Review*, vol.33, no.6 (Sep. 2012), p.2。
- [46] 实际上,国内学界当前围绕英文教育(特别是外国文学)的存在价值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也正源于此。参见蔡基刚:《大学英语:如何避免“水课”成就“金课”》,《文汇报》2018年11月16日,第7版。该文随后以《英语专业是否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复旦学者:“病得不轻”》为题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和公众号被广泛传播,影响极大,并引发诸多学者回应。参见曲卫国2018年12月1日微博文章:《英语专业被蔡基刚莫名其妙地良心拷问之后》, https://weibo.com/u/1652118111?is_search=0&visible=0&is_all=1&is_tay=0&profile_ftype=1&page=6#feedtop; 阮炜:《何为英语专业?》,《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4期。
- [47] Jeffrey Nealon, *Post-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Just-in-Time Capit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79.
- [48] Stephen Marche, “Back in the MLA”, *TLS*, June 7, 2019, Issue 6062, p.17.
- [49] J. Hillis Miller,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9, no.3 (2019), p.351.
- [50] Ivan Callus & Stefan Herbrechter, “Coda: Theory Reloaded”, in Ivan Callus & Stefan Herbrechter (eds.), *Post-Theory, Culture, Criticism*, New York: Amsterdam, 2004, p.283.
- [51] M. McQuillan, G. Macdonald, R. Purves & S. Thomson, “The Joy of Theory”, in M. McQuillan, G. Macdonald, R. Purves & S. Thomson (ed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p.xxvi.
- [52] Jean-Michel Rabaté, *Crimes of the Future: Theory and its Global Reproduction*,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30.
- [54] Gayatri Spivak, “From Haverstock Hill Flat to U. S. Classroom, What’s Left of Theory”, in J. Butler, J. Guillory, & K. Thomas (eds.), *What’s Left of Theory?: New Work on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
-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何兰芳